

智能原生之龙：技术民族主义竞争时代中国 “人工智能+”行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宋京平
香港社会科学中心

摘要 本文对中国国务院于 2025 年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进行了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指出，该行动标志着中国从数字化向系统性智能化的战略转向，其理论根基是“新质生产力”政治经济学说。文章认为，该战略通过培育“智能原生”产业和推动“全要素智能化”，旨在构建自立自强的“智能经济”。然而，该计划的推进面临三重困境：一是中美技术民族主义竞争日趋激烈，半导体领域的封锁制约尤为突出；二是国内在高端人才与数据治理方面存在结构性短板；三是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与欧美权利本位、市场本位的模式形成张力。本文通过比较中国、欧盟与美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并结合地缘政治和国内实施的现实瓶颈，剖析了“人工智能+”战略的可行性边界。结论认为，该行动不仅是产业政策，更是一份面向 21 世纪的国家治理蓝图，既关乎民族复兴，也深刻塑造着全球技术秩序与社会经济结构。

关键词 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智能原生；技术民族主义；全球治理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407>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5.0704.58-66

引言：从“连接”到“生成”的战略跃迁

（一）政策背景：作为国家意志加速器的“人工智能+”行动

国务院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 号），标志着中国国家技术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项政策并非孤立的举措，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先前战略规划基础之上，特别是 2017 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 年的规划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框架，设定了至 2030 年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宏伟目标。然而，2025 年的“人工智能+”行动是在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经历爆炸性发展以及中美战略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双

© The Authors 2025.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19 May 2025; Accepted: 25 June 2025; Published: 31 August 2025 (online).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 2664-1720 (Online). Email: wto-com@gmail.com, <https://ssci.cc>, <https://cpcl.hk>.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CPCL™)** 开元出版有限公司. This is an open-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which permits non-commercial use, sharing,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or format, provided the original author(s) and source are credited, and derivative works are licensed under the same terms.

重背景下，对既定时间表的显著加速和战略深化。

该行动的核心在于完成了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范式跃迁。这一转变远非技术层面的简单升级，而是反映了国家在经济价值理论和社会治理逻辑上的根本性变革。“互联网+”的核心功能在于“连接”，即通过信息技术的普及，将现有的经济参与者、生产要素和数据点连接起来，其主要目标是优化存量、提升效率。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是“生成”，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生成新的知识、实现认知劳动的自动化，并从根本上重构生产函数与业务流程。如果说“互联网+”是对现有流程的数字化改造，那么“人工智能+”则寻求创造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的新流程、新业态，即所谓的“智能原生”企业，从而根本性地改变经济活动的“运行逻辑”。因此，该政策标志着中国的发展战略从将技术视为现有经济范式内的效率工具，转变为利用技术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范式，这对国家规划、产业组织和劳动力市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二）核心论点与研究问题：解析“智能经济”宏图下的三重困境

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是一项双重叙事的国家战略：它既是应对外部地缘政治压力的技术民族主义对策，也是旨在构建自立自强的“智能经济”的国内经济转型蓝图。然而，这一宏大战略的最终成效，取决于中国能否有效破解一个由外部压力、内部瓶颈和治理模式张力构成的、相互关联的“三重困境”。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探究以下三个核心问题：（1）在地缘政治层面，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旨在维持其技术霸权的战略遏制，中国能否有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困境，尤其是在作为算力基础的先进半导体领域？（2）在国内实施层面，为实现“全要素智能化”的宏大愿景，中国能否克服其在高端人力资本和高质量数据基础设施方面的结构性短板，从而为“智能经济”的构建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3）在治理模式层面，中国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核心优先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导向型治理范式，将如何与以欧盟（基于权利）和美国（基于市场与霸权）为代表的、建立在不同哲学基础之上的新兴全球规范进行互动、竞争乃至冲突？

（三）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为系统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将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比较治理和国际关系理论，对“人工智能+”行动进行多层次的剖析。第二部分将深入探讨该行动的理论基石，即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说的“新质生产力”。第三部分将在全球比较的视野下，解构中国、欧盟和美国三种截然不同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哲学分野。第四部分将聚焦于前述的“三重困境”，批判性地评估该战略的可行性边界。第五部分将该行动置于中美技术民族主义竞争的宏观背景下，分析其对全球技术秩序的潜在影响。第六部分将考察其可能引发的国内社会经济后果。最后，第七部分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中国“智能原生之龙”的未来路径进行前瞻性分析。

一、理论基石：作为政治经济学说的“新质生产力”

（一）解构“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阐释与政治功能

“人工智能+”行动的理论合法性与意识形态框架，深植于“新质生产力”这一政治经济学说。“新质生产力”被官方定义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新型生产力形态。^①其核心构成要素包括：以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为主导驱动力；将数据确立为与高技能劳动力和智能化基础设施并列的新型生产要素；以及通过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审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显著的内外双重功能。首先，它不仅是一项经济现代化战略，更是一种为强化国家干预和推行技术民族主义产业政策提供政治辩护的理论工具。通过援引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第191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该学说将国家主导的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重新叙述为“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步骤。这一理论建构，使得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对国有企业的资源倾斜以及动用国家产业基金等行为，在国内治理框架内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被定义为“解放和发展”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力，而非市场扭曲行为。在内部层面，它为克服既有利益格局、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在外部层面，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批评，该学说构建了一套对抗性的话语体系，将中国的产业政策描绘成顺应全球技术发展规律的自然演进，从而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撑^①。

（二）“智能经济”与“智能原生”：国家资本主义的新范式

“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通过设定构建“智能经济”和培育“智能原生”企业的目标，将“新质生产力”理论付诸实践。“智能原生”这一概念是对“数字原生”的超越，其核心差异在于企业的底层架构和运行逻辑从根本上由人工智能驱动，而非仅仅是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或网络化协同。例如，AI智能体开发平台、AIPC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其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

与此同时，该计划提出的“全要素智能化”愿景，描绘了一幅将人工智能渗透到第一、二、三产业所有环节——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的宏大蓝图。这不仅要求企业层面的技术应用，更需要国家层面的系统性规划和资源调动，例如建设全国一体化的算力基础设施、推动跨部门的数据要素流通以及调整劳动力技能结构等。这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所构想的“智能经济”，是一种深度融合了国家战略意图和产业资本力量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范式。

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三重叙事：模式分歧与哲学分野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沿着三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演进，其背后反映了各自迥异的政治哲学、战略优先与社会价值观。理解这些分歧，是把握中国“人工智能+”行动所处国际环境的关键。

（一）中国模式：发展权与安全并重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

中国开创了一种以国家为中心、以控制为导向的垂直化（针对特定应用）监管模式，其核心优先事项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可控。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为代表的法规体系，对服务提供者施加了严格的义务，包括内容审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训练数据“来源合法”、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强制性标识以及用户实名认证等。这种模式体现了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将技术发展置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绝对优先之下。在国际层面，中国积极倡导人工智能的“发展权”，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普惠的全球治理体系，旨在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共享技术红利，并以此提升自身在全球技术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②。

（二）欧盟模式：基于权利与风险的规范性力量及其“布鲁塞尔效应”

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个全面、横向的人工智能法律框架，其立法哲学的基石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安全与健康。该法案的核心是一种基于风险的分层管理方法，将人工智能系统划分为不可接受风险（如社会评分系统，被明令禁止）、高风险（如用于关键基础设施、教育、执法的系统，受到严格规制）、有限风险（须履行透明度义务）和最小风险（基本不受监管）四个等级。欧盟希望凭借其庞大的单一市场规模，再次催生“布鲁塞尔效应”^③。该效应指的是，全球跨国企业为了进入欧盟市场，不得不遵守其严格的法规标准，从而在事实上将欧盟的规则提升为全球标准，正如其在数据保护领域的《通用数

^①简新华、聂长飞：《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省际现状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10期。

^②薛澜、梁正：《构建包容、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现实挑战与前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9期。

^③刘子靖：《欧盟〈人工智能法〉演进、规则与启示》，《德国研究》2024年第3期，第39卷。

据保护条例》(GDPR)所实现的那样^①。这一战略旨在将欧盟的价值观和以权利为本的治理理念输出到全球。

(三) 美国模式：市场创新与技术霸权驱动的复合体

美国的模式表面上呈现为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优先的特征，其监管相对宽松，更多依赖于自愿性标准、行业特定法规和行政命令，而非单一的综合性法律，旨在最大限度地激发私营部门的创新活力以保持其全球技术领先地位。然而，在其“自由市场”的表象之下，深藏着维护国家技术霸权的内核。美国的 AI 战略由国家安全议程强力驱动，表现为通过《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等进行大规模、长周期的研发投入，并利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手段系统性地打压战略竞争对手^②。

更深层次地看，美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正在演变为一个“数字军事工业复合体”。美国国防部，特别是其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长期以来是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核心资助者^③。硅谷的科技巨头和初创公司 (如 Palantir) 与五角大楼的合作日益深化，深度参与情报分析、自主武器系统等国家安全项目^④。同时，政府、军方和科技企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人员“旋转门”现象，进一步强化了三者的利益捆绑^⑤。这一体系的运行逻辑表明，美国的 AI 治理并非纯粹的“市场驱动”，而是一个由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目标主导的、公私部门高度融合的复合体，其“创新优先”的政策话语，实质上服务于维持其全球军事和技术霸权的最终目的。

(四) 比较分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结构性冲突

为系统性地揭示上述分歧，下表从多个维度对三种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这种结构化的对比清晰地展示了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格局的根本性哲学差异和优先事项冲突。例如，将中国的“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欧盟的“保护基本权利”以及美国的“维持技术领先”并置，便能立即凸显其核心的意识形态分野。这些不可调和的底层价值观和战略目标，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将面临长期的结构性冲突，并为后文关于全球技术秩序分化的讨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表 1: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比较框架 (中国 vs. 欧盟 vs. 美国)

维度	中国	欧盟	美国
首要目标	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保护基本权利、安全与健康	维持经济与技术领先、促进创新
监管模式	国家主导、垂直化 (应用特定)、控制导向	横向化 (跨行业)、基于风险、上市前审批	市场驱动、行业特定、部署后执法、研发为重
关键法律文书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深度合成管理规定》、未来《人工智能法》	《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行政命令、行业法规	
核心义务	《人工智能法案》(EU)2024/1689)	风险评估、数据质量、人类监督、	
高风险系统透明度	内容审查、数据来源合法、实名认证、强制标识		
禁止性规定	自愿性标准、伦理原则、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禁止“不可接受风险”应用 (如社会评分、操纵行为)	有限的直接禁止；侧重通过研发和指南管理风险
	禁止危害国家政权或社会秩序的内容		

^①林勤富：《欧盟〈人工智能法〉之制度设计、规范内涵与治理局限》，中国台湾省《“中研院”法学期刊》第 36 期，2025 年 3 月。

^②宋瑞、柳媛：《引育结合解渴 AI 人才》，《望》周刊，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7 日，<http://lw.xinhuanet.com/20250420/11edf322574944bfb67281a1318209a6/c.html>。

^③银河实验室：《AI 强军：DARPA 2026 预算揭示美军人工智能战略全景图》，<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80698>。

^④陈子帅、伊文：《五角大楼与硅谷企业组建“AI 军工复合体”？》，《环球时报》2024 年 12 月 22 日。

^⑤赵明昊：《技术-安全复合体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https://cn.chinausfocus.com/energy-environment/20250114/43553.html>。

三、三重困境：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可行性边界

尽管“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但其实现路径却布满了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构成了决定该战略成败的可行性边界，具体可归结为外部制约、内部瓶颈和治理张力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一）外部制约：半导体领域的战略“卡脖子”与自主化困境

1. 美国出口管制体系的精准打击

中国人工智能雄心的最大外部制约，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系统性的技术封锁，其核心是半导体领域的“卡脖子”战略。美国通过其《出口管理条例》（EAR），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环节的精准打击体系，其目的不仅是延缓中国技术进步，更是意图“彻底绞杀中国的高科技产业”^①。这一体系的打击范围覆盖了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个算力基础：首先是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如英伟达的 H100、H200 等旗舰产品；其次是限制提供先进的芯片设计软件（EDA），这是芯片设计的命脉；最后是联合盟友（如荷兰、日本）共同管制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SME）的出口。这一全产业链的封锁，使得中国在先进逻辑芯片制造方面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 2 至 3 代的技术差距，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大规模构建先进算力集群的能力。

2. 国产替代的进展与性能差距：以 昇腾系列与英伟达旗舰芯片为例

面对美国的封锁，中国将技术自主化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大力扶持国内半导体产业。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以华为公司研发的 昇腾（Ascend）系列为代表的国产芯片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客观评估显示，国产替代方案在性能上与国际顶尖产品仍存在差距。例如，有分析指出，昇腾 910C 芯片的性能约为英伟达 H100 的 60%^②。尽管最新的昇腾 910C/D 系列在特定场景下已能与英伟达的降级版产品（如 H20）乃至部分旗舰产品（如 H200）形成竞争^③，但在整体性能、能效比以及更关键的软件生态系统方面，差距依然明显。英伟达的 CUDA 平台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庞大而成熟的开发者生态，这是国产芯片在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壁垒。华为虽然在积极构建自主的 CANN 软件生态并推动其开源^④，但生态的培育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投入，这构成了自主化道路上的严峻挑战。

（二）内部瓶颈：驱动“全要素智能化”的结构性短板

1. 人力资本赤字：基础层人才的结构性失衡

“人工智能+”的实施，需要海量的高端、跨学科人才，而这恰恰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另一个严峻瓶颈。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问题并非总量不足，而是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从事应用开发、产品部署的应用层人才相对过剩，而从事芯片设计、核心算法、基础理论研究等基础层领域的顶尖人才则面临严重短缺。有报告显示，基础层岗位的供需比甚至低至 0.3。这一结构性短板的根源在于教育体系的滞后。尽管近年来中国高校纷纷开设人工智能专业^⑤，但课程设置往往过于理论化，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培养出的毕业生普遍存在“动手能力欠缺”的问题，难以满足企业在真实场景下的研发需求。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美国依然是顶尖人工智能人才的首选目的地，这对中国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目标构成了长期挑战。

2. 数据基础之殇：“数据孤岛”与“数据要素×”行动的挑战

^①CSIS 报告：《卡断中国通往人工智能的脖子——商务部新出口管制措施作用探析》，安全内参，访问时间：2025 年 8 月 27 日，<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48858>。

^②Timothy Fries:Nvidia Vs. Huawei: Can the Chinese Giant Catch Up With the AI Chip Leader?, <https://www.investing.com/analysis/nvidia-vs-huawei-can-the-chinese-giant-catch-up-with-the-ai-chip-leader-200660080>

^③Maximum Games, NVIDIA Admits: Huawei Reaches H200 Level——US Loses China AI Accelerator Market, 30 May 2025. <https://en.gamegpu.com/iron/nvidia-recognized-huawei-reached-h200-level-usa-loses-chinese-market-and-gains>.

^④AleksandarK, NVIDIA Reportedly Ends H20 GPU Production, Makes Room for B30A, <https://www.techpowerup.com/news-tags/H20>。

^⑤林靖：《AI 人才缺口超 500 万近五年超 400 所高校新设人工智能专业》，《第一财经》，<https://www.yicai.com/news/102731033.html>。

高质量、大规模、可流通的数据是训练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燃料”。尽管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数据总量，但在数据治理和基础设施方面却面临着常被忽视的严峻挑战。其中，“数据孤岛”现象尤为突出，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被分割、锁定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私营机构内部，因缺乏统一标准、存在部门利益壁垒而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和共享^①。这导致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一致性差，极大地限制了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②。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政府推出了“数据要素×”行动计划，旨在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公共数据的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打破“数据孤岛”^③。然而，该行动在实施层面依然面临着数据所有权界定模糊、跨部门协调困难、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顾虑等多重阻力，其成效仍有待观察^④。

（三）治理模式的张力：国内控制逻辑与全球规范的互动

上述三大制约因素——芯片、人才和数据——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负反馈循环。缺乏先进的国产芯片，使得吸引和留住希望使用最前沿硬件的顶尖人才变得更加困难；而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短板，又反过来拖慢了芯片、EDA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的进程；同时，薄弱的数据基础设施和根深蒂固的数据孤岛问题，限制了现有硬件和人才的效能，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模型和算法，在处理低质量、碎片化的数据时也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更深层次地分析，这一负反馈循环与中国独特的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张力。一方面，这种治理模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国家层面动员海量资源投入到芯片研发等战略领域，这是其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的优势所在。但另一方面，该模式对信息流动、组织边界和市场活力的严格控制，恰恰是造成“数据孤岛”难以打破、抑制基础研究领域自由探索（从而影响顶尖人才成长）的制度性根源之一。国家试图通过更强的顶层设计（如“数据要素×”行动）来解决由过往的顶层设计和条块分割所造成的问题，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治理上的悖论。“人工智能+”战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否在不放弃其核心控制权的前提下，对自身的治理模式进行深刻的、实质性的调适，以真正释放创新生态的活力。

四、地缘政治的回响：技术民族主义与分化的全球秩序

（一）人工智能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场域

在21世纪的大国博弈中，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已被普遍视为决定全球领导地位的核心竞争场域。中国将发展人工智能明确视为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技术自立以对抗美国遏制政策的国家战略。相应地，美国则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进步视为对其经济、军事乃至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直接威胁，并以此为其系统性的“卡脖子”战略提供了国家安全层面的正当性。在这种认知框架下，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演变为一场零和博弈，深刻地塑造着两国的内外政策。

（二）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全球主义的二元性策略

中国的战略并非完全走向封闭和孤立，而是展现出一种务实的二元性。一方面，技术民族主义是其战略的主线，体现在通过“举国体制”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强调军民融合，以及利用国家主导的产业基金来构建一个能够抵御外部制裁的、自给自足的国内技术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中国又在战术层面奉行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全球主义。其科技巨头深度融入并贡献于全球开源框架（如PyTorch），同时国家政策也鼓励有选择性的国际合作，以吸收外部知识、引进高端人才，从而弥补自身在基础研究等领域的短板。

这种二元性的背后是一种服务于最终战略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西方世界通常将“开放合作”视为

^①樊杰：《AI数据湖：连通数据孤岛，加速智能涌现》，2024年，<https://e.huawei.com/cn/blogs/storage/2024/ai-data-lake>。

^②艾瑞咨询：《中国面向人工智能的数据治理行业研究报告》，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3291555762406_1.pdf。

^③夏彦、解石坡、吴康：《“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数据要素市场加速布局（上）》，<https://www.hankunlaw.com/portal/article/index/cid/8/id/13886.html>。

^④国家数据局：《文字实录 | 国家数据局举办“数据要素×”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2025年6月24日，访问时间：2025年8月27日，https://www.nda.gov.cn/sjj/zwgk/zcjd/0625/20250624215213054538293_pc.html。

一种内含的价值观，而中国的策略则更多地是将其视为在追赶阶段获取知识和技术的有效途径。其参与全球体系（如开源社区）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其技术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追赶并最终超越美国。这种工具性的参与模式，旨在利用全球知识体系来加速国内替代方案的构建。一旦国内生态系统成熟，对外部体系的依赖便会降低，甚至可能转而向全球推广自身的技术标准。这种策略对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合作体系构成了长期的战略性挑战。

（三）走向“数字巴尔干化”：平行的技术生态系统

前述的治理模式冲突和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不可避免地推动全球技术生态系统走向分裂，形成所谓的“数字巴尔干化”。未来世界极有可能出现两个或多个以中美为核心的、相互平行的技术生态系统，它们在技术标准、供应链、数据流乃至底层操作系统层面都相互独立、互不兼容。这种技术秩序的碎片化将迫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在技术上不具备完全自主能力的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中国的“人工智能+”行动，特别是其在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的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人工智能服务、标准和能力建设方案的目标，可以被视为其在这一正在形成的分化秩序中，积极构建自身影响范围和技术势力圈的战略布局。

五、国内社会经济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重构与伦理前沿

（一）对劳动力市场的双重冲击：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与结构性失配

“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全面实施，将作为催化剂，加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深刻重构。其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人工智能将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尤其是在制造业、客户服务、数据录入等领域，大量依赖重复性、规则化操作的认知和体力劳动岗位面临被自动化替代的风险。研究表明，女性、年长劳动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等弱势群体，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不成比例的冲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将催生新的岗位需求，即创造效应，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专家、数据科学家、算法工程师等高技能专业领域，同时也会改变现有工作的模式，要求广大劳动者具备与人工智能系统协同工作的能力。

然而，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的净结果以及转型的速度，将对社会稳定构成重大挑战。该计划的推进将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本已存在的结构性错配问题——即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旺盛但供给严重不足，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则相对过剩。这可能无意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催生一种新的分层结构，将人口划分为能够驾驭人工智能的高技能“人机协作”阶层，和被边缘化的、从事不稳定的“微工作”或面临长期失业的低技能阶层。这给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带来了严峻挑战。

（二）新兴的社会伦理挑战与“中国式”人工智能伦理的构建

人工智能的广泛部署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推向了前台，而中国正试图通过其独特的治理视角来加以应对。首先是算法偏见与公平问题。基于历史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延续甚至放大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地域、性别、民族等偏见，这是一个全球公认的挑战。尽管中国的法规要求防止歧视，但国家自身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社会治理和监控的做法，引发了关于公平和公民权利的复杂讨论。

其次是数据隐私与国家监控之间的根本性张力。训练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海量数据，这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所保障的个人隐私权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尽管法律对个人信息处理设定了严格的规范，但国家安全机构在法律框架下仍拥有广泛的数据访问权限，这催生了一种被部分西方学者称为“数字威权主义”的治理模式，即人工智能技术增强了国家监控和管理社会的能力。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计划所呼吁建立的人工智能伦理和法律框架，并非简单采纳西方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原则，而是旨在创建一个与中国政治价值观相符的治理体系。该体系更强调集体利益、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这与欧盟以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论：描绘智能原生之龙的未来路径

（一）研究发现综述

本文通过对中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深入剖析，论证了该计划是一项全面而宏大的国家级战略，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在技术上自立自强、在全球范围内具备领先地位的智能经济。该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新质生产力”这一政治经济学说，并通过发展“智能原生”产业和实现“全要素智能化”来具体实施。然而，该计划并非一张通往成功的确定性蓝图，其发展轨迹将由其宏伟目标与一系列严峻制约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所决定。

（二）三重困境重审：决定成败的关键变量

本研究分析证实，由地缘政治竞争、国内实施瓶颈和治理模式分歧构成的“三重困境”，将是决定“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成败的关键自变量。在外部，以美国为主导的半导体“卡脖子”战略构成了最直接和最严峻的威胁，它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算力基础。在内部，高端人才的结构性和数据基础设施的治理难题，是最主要的内生性风险，直接关系到“全要素智能化”能否从概念走向现实。而中国独特的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深刻的内在张力：它既是动员全国资源以图实现技术突破的强大工具，但其对控制的偏好也可能抑制在技术前沿取得真正领先地位所必需的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力和开放的生态系统。这三大困境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道路上的系统性风险。

（三）未来轨迹展望与全球性意涵

中国这条“智能原生之龙”的未来路径，将对 21 世纪的全球秩序产生深远影响。若其能成功克服或有效缓解“三重困境”，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并成功构建起繁荣的智能经济，那么这将极大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并向世界验证其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从而加速世界向技术多极化、秩序多元化的格局演变。反之，若其长期受困于三重困境而发展停滞，则可能引发国内社会经济压力的增加，并可能导致其在国际上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以转移内部矛盾。归根结底，“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民族复兴愿景而进行的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国家级豪赌。它体现了中国利用人工智能这一变革性力量重塑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坚定决心，其最终结果将深刻地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格局。

引用本文 宋京平. 智能原生之龙：技术民族主义竞争时代中国“人工智能+”行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5, 7(4):58-66.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407>.

Cite This Article Emily SONG(2025). The Intelligent Native Dragon: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China's "AI+" Initiative in an Era of Techno-Nationalist Compet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7(4):58-66. <https://doi.org/10.6914/tpss.070407>

The Intelligent Native Dragon: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China's "AI+" Initiative in an Era of Techno-Nationalist Competition

Emily SONG

Hong Kong Center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pinions on Deeply Implement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us" Initiative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n August 26, 2025, arguing that the initiative is not merely an industrial policy upgrade but rather a systemic strategy for reshaping China's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geopolitical rivalry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uild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nationalism -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study identifies a paradigm shift from "technological ambition" to

“application supremacy,” with core metrics moving from industrial scale to application penetration. The strategy is underpinned both by technological confidence stemming from breakthroughs in domestic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by the urgent need to respond to U.S. containment and domestic growth slowdow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rough a whole-of-nation approach, China seeks to deeply integra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real economy, thereby achieving scale and speed advantages at the application level to offset hardware deficiencies and position itself as an “application-oriented AI superpower.” Despite structural bottlenecks in computing power, talent, and data, the strategy is likely to yield “partial but far-reaching successes,” contributing to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landscape and digital geopolitics.

keywords AI+;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I-native economy; Techno-nationalism; Glob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李昌奎 Email: wtocom@gmail.com)